

序

孫受匡與香港的因緣

盧瑋鑾

黃潘明珠能寫成這本書，真可以說是一場異數。

何謂異數？

先說作者所學專業，是英國電腦情報學、資料處理系統技術，然後加上圖書館管理經驗，一切看來與香港文學研究無關。

再說到我，儘管許多人都說我專門蒐集及研究香港文學資料，但認真講，我的研究起點雖然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因原始文獻難找，局限了我的視野，故從不敢插手多寫香港二十年代前後香港文學論文。可是，總不忘侶倫先生曾再三向我提到：「妳要注意孫受匡。」怎樣注意？在僅能找到零星的早期文藝雜誌如《伴侶》、《鐵馬》、《島上》等中，都沒見過這名字，偶然追問一下，他只說「他兒子在香港，叫孫秉樞。」等到我斷斷續續找到「受匡出版部」的出版物，隱約知道他是個輪船買辦，跟作家袁振英相熟，出版的文學書刊思想都不簡單，這都不算什麼頭緒。一直等到在神州舊書店找到他年輕時作品《熱血痕》，讀到內容，我才訝異果然值得注意。一說注意，就

發現手頭所有一點點線索，起不了作用。有一天，與黃太（我一向這樣稱呼潘明珠的。）閒談，我對黃太說：「孫受匡值得研究呀！不如妳去找資料，做篇論文啦。」異數就開始了。

說這話是 2017 年。以後黃太幾乎連年都去英、美旅行探親。在遠地卻常傳來去不同大學圖書館找到孫受匡的資料，全是我未見過，而一讀就令我得到大開眼界的新知識，刺激得很。而其中提及孫受匡前半生豐富的事與人，大可建構出部份早年香港社會、文化、政治的複雜全新繪圖，特別自 1919 年「五四」至抗日戰爭一段日子，解開了我多年來無數疑團：《華字日報》上新聞報道對被捕學生身份與學校關係、香港學生運動情況太簡略。香港大學學生組織「學生賑濟委員會」政治立場的模糊。早期香港文學作者謝晨光的曖昧身世……。她找到的史料，最重要是立體呈現一位英國殖民地教育制度下成長、又以輪船買辦為職業的香港年輕人——孫受匡，從中學開始，如何在香港連繫了中國血脈關係，試圖衍生一種「把這冥頑不靈底社會中的青年的醒覺反映於事實上的，是新的追慕和舊的破壞，而直接表現出來的正是文化。」^註這一切因緣，卻一直沉埋在有意被人遺忘的歷史中。新發現令我對孫受匡與中港的關係愈來愈感興趣，這些史料非面世不可。我決定加大力度，請黃太努力把珍貴資料組織好，落實寫成文章來。用黃太的說話描述過去幾年的經歷：她從未用中文寫過學術性文字，且對香港文學前因後果並

無多大認識，只因一頭栽下去資料網後，就正中我常說的「泥足深陷，不能自拔」，每尋得一條新資料，快樂與滿足，不可言喻，但一動筆寫文章，則如一場「噩夢」。

最近兩年，我逼得她很緊，甚至要她 2021 年初就完成文章。終於，三月初她交來完整的五章文字。

與香港文學全拉不上關係的人，在沒有預設一定研究方向情況下，在茫茫字海中展開大渡海的旅程，結果為香港早期文學——嚴格應說是香港文化尋出被遺忘的一頁，這不就是異數嗎？

這本書，儘管好像只展示着孫受匡上半生行事資料，沒有廣度及深挖許多與香港文化、社會處境的因緣，但正如作者在〈結語〉中說「並不只是描寫一個人一生的奮鬥史，而是在一個大時代，一個或幾個人如何可以以一己之力貢獻社群。」使讀者仍可從中發現無數可為闡釋、研究的空間。而作者完成這異數後，我希望她從此更可開啟自己的香港文學專業工程，繼續挖掘被遺忘的歷史資料了。

讀畢全書，我不禁有下列幾種想法或疑問，提出來讓感興趣的讀者也想想：

第一 由於作者找到許多難得史料，與主題無關的一時用不上，就放在註中，愈是罕見的愈詳盡。我們不可輕視或忽視全書註釋，因為這足供有心人另開一個新的研究主題。例如第四章（四）謝晨光一項，這位最早與上海文學界、魯迅有聯繫的香港早期現代文學作家，

如果讀者細心看註釋中他歷年工作背景，就會對他政治立場變化感到好奇，深入研究，當知有些文人與政治關係的複雜性。

第二 專研香港早年學生運動的專書不多，但也算有幾本，可是除了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提及孫受匡外，內地出版的都沒有提過他。讀完本書，不禁深思原因何在。第一章中提到很多香港學校名字，而學生的愛國運動中主力分子，均多出自英文名校。在英國殖民地政府嚴格管治與設計的教育制度下，香港學生怎樣能形成如此堅執的愛國觀念？

第三 作者在第二章用了整第一節，陳述早年英殖民政府的「書刊出版註冊條例」，用意何在？與第九節配起來，能否看到「受匡出版部」停辦真實原因？

第四 孫受匡既出版嚴肅文學作品，又與羅澧銘合辦給一般人視為「以風趣消閑為主」，並帶濃厚塘西風月味的小報《骨子》，是否矛盾？應否細尋究竟？而我常說研究香港文學或社會文化，不能忽視「小報」或庶民喜讀的報刊消閒副刊，就因早讀了二十年代《骨子》、三十年代《立報》、四十年代以後的《成報》、《晶報》、《銀燈》等等，發現香港無數純文學作家多寄身報紙副刊，謀生或發聲。這

是否屬香港辦報刊的一種特別策略？還是香港作家無可避免的命運？

第五 孫受匡創辦「受匡出版部」出版香港、廣州青年作家作品。開設「亞新書店」代售上海出版的文藝雜誌、書籍，是否反映了早年的滬省港三城的文化交流關係？這是個好有意思的研究題目。

第六 從第三章第三節，讀到 1922 年由幾個中學生創刊的《香港策群》的〈創刊宣言〉中（三）項：「本報由策群校員——即各校學生辦理。作為香港策群義學校報，所以言論的範圍和語氣，都要有些斟酌。不能把我們的意思盡量發表。還望閱者和投稿諸君，代我們設身處地別要責難太奢。」這種婉轉委曲求全的態度，與 1928 年到 1937 年，青年人所辦文藝雜誌如《鐵馬》、《激流》、《字紙簍》的〈創刊詞〉、〈編輯的話〉中說：要在寂寞、落伍、冥頑不靈環境中掙扎及反擊，更令人感到淒然。但原來連這樣溫和態度的編者，仍會「被香港當局請去『問話』」，並只出版了一期，就「惹得香港政府要害怕」而消失了。究竟中年以後的孫受匡，怎樣面對這種香港宿命？

認識了孫受匡與香港的因緣，也許，有心有力的讀者還會有更多疑團或想法，從而另闢蹊徑繪寫早期香港文學發展史、香港社會史……，反省香港人應如何處理這城市的歷來命運史，又該如何走向未來的道路。相信這本書只是個開端，踏踏實實追尋前人走過的艱難細節，方知那不是神話。要有血有淚才能跨過生存場域，建構一個理想世界，也非自今日始。我們應該堅信：世代總有接棒人。

2021.5.15

註：引文出自貝茜（侶倫）〈香港新文壇的演進與展望〉，《工商日報》「文藝週刊」第94期，1936年8月18日。

緣起

黃潘明珠

我寫這本書不能說是研究孫受匡（又名孫壽康）或 1920、30 年代孫氏朋輩作家的成果。我一生從事圖書館工作，有幸認識筆名小思的盧瑋鑾教授。2000 年與中文大學圖書館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包括劉麗芝、馬輝洪等，在小思的指導下於 2001 年 2 月成立「香港文學資料庫」¹，免費公開給各界使用。又幸得盧瑋鑾教授（小思）於 2002 年，將她畢生的珍藏 30,000 冊書刊，捐贈給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圖書館於 2003 年正式成立「香港文學特藏」。今年 2022 年適逢該特藏成立廿周年，特選出「香港文學特藏」內最具研究價值而難得一見的珍貴資料之一《熱血痕》談談。該書是香港第一個新文化機構「受匡出版部」的創辦人孫受匡先生所著的小說（1923）²。

有關香港 1920 年代文學的資料比較零碎，尋找不易。

1 馬輝洪〈從紙本到網絡——記小思與“香港文學資料庫”〉，《香港文學》201 期，2001 年 9 月，頁 35，詳細記載「香港文學資料庫」成立的過程。

2 網頁：<https://www.lib.cuhk.edu.hk/tc/collections/spc/theme/hklit>，擷取日期：2019 年 8 月 23 日。

劉以鬯³在袁良駿的《香港小說流派史》⁴序中說：「幾年前，我在灣仔一家舊書鋪購得一本書，書名《仙宮》，出版於1927年11月15日，比《伴侶》早幾個月。雖然屬於『廣州文學叢書』，卻由香港『受匡出版部』出版，有詩，有小說，都是新文藝作品，全部橫排，內容較後來的《伴侶》更新。讀了這本書，我終於看到了一些以前未曾見過的香港文學足跡。為了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我寫過一篇題名《讀〈仙宮〉》⁵的短文，發表於1992年……希望有人肯做進一步的挖掘，搜尋更多依據。《伴侶》在香港文學史的重要性固然不容抹殺，《伴侶》前的香港文學也需要有人對準焦點仔細看看。」本書正是隨着先賢的教誨而進行的第一步。

要了解「受匡出版部」的誕生，就不能不了解及研究孫受匡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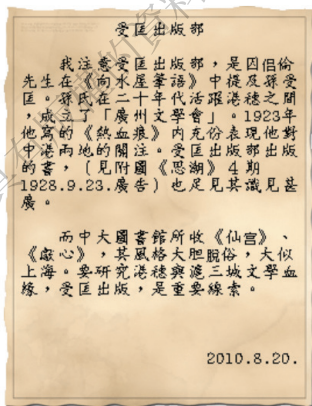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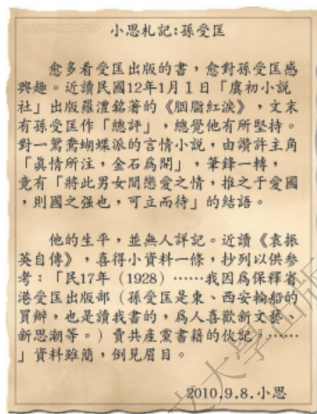
早於2010年8月及9月，小思在「香港文學資料庫」網站寫了兩則「小思札記」，提出三條重要的「線索」，或可說是「發人深省、引人着迷」的疑問。第一項疑問關乎孫受匡，為什麼談情說愛也可以說是愛國呢？事由孫受匡在好友羅澧銘著的小說《胭脂紅淚》書末所作的「總評」，小思覺得孫受匡對國家是「有所堅持」的，因為他對這本「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由讚許主角『真情所注，金石為開』，筆鋒一轉，竟有『將此男女間戀愛之情，

3 劉以鬯（1918—2018）上海出生，1948年赴港。代表作有《對倒》、《酒徒》等等。曾任多份報紙包括《香港時報》、《星島晚報》、《快報》副刊編輯。1985年創辦《香港文學》月刊，該刊刊行至今。2015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2014香港藝術發展獎」之「終身成就獎」。2018年在港辭世。

4 袁良駿《香港小說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頁1—2。

5 劉以鬯《讀〈仙宮〉》1992年11月1日《文匯報》「文藝」。

推之于愛國，則國之強，也可立而待』的結語。」第二項疑問是孫受匡與袁振英是什麼關係呢？袁振英又是何許人？這兩項疑問出自第一則札記。第二則札記關乎「受匡出版部」，小思認為「受匡出版部」是研究滬港粵「三城文學血緣」的重要資料。而這第三項疑問是：「受匡出版部」出版了什麼書，為什麼「風格大膽脫俗」，是否香港1920及30年代的出版受到上海出版風格所影響呢？



■ 〈小思札記：孫受匡〉⁶

■ 〈小思札記：受匡出版部〉⁷

2016年10月與小思作伴，前往日本東京神田的書店街淘書。我在神田街找到一套英文書 *Who's Who in China*（《中國名人錄》）第二版，由1920年出版至1950年，歷時30年，合共五冊，最初由當時上海 Millard's Review 出版。當時我在想，如果外國人也有這樣的堅持去尋找中國

6 網頁：<http://hkliitpub.lib.cuhk.edu.hk/news/iss86/index.htm#2>，擷取日期：2020年9月9日。

7 網頁：<http://hkliitpub.lib.cuhk.edu.hk/news/iss85/index.htm#2>，擷取日期：2020年9月9日。

名人資料出版，為什麼我們中國人、香港人不好好寫自己的歷史，將史實盡量留存下去，正如 *Who's Who in China* 一書在序中說：「自 1918 年 1 月至今（1920 年 11 月），中國已有四次內閣改組，要緊貼時代的轉變是非常困難的。」

我開始尋找孫受匡背景資料。首先查閱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書刊目錄，看看藏有多少孫壽康或孫受匡的作品和「受匡出版部」出版的書籍。孫受匡的作品只有《熱血痕》書一種，及與羅澧銘合辦的《骨子》三日刊報紙；「受匡出版部」出版的原版書籍只有四種。再查閱八間大學的聯合目錄（HKALL），只在香港大學圖書館找多一本。再查國內高校聯合目錄（CALIS），只找到幾種，分散大江南北，遠至內蒙古大學，近至廣州中山大學。再查閱含 20,000 多間大學圖書館分佈於世界各地的聯合目錄（WorldCat），竟然發現耶魯大學圖書館有六種。耶魯大學圖書館為美國規模第一大的大學圖書館之一，藏書達 11,000,000 冊。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收藏了「受匡出版部」六種原版書，為收藏「受匡」出版書籍最齊全的圖書館。

為什麼美國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圖書這麼豐富，這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說起。日本由上世紀 30 年代佔據中國，發展到將其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擴大到東南亞各國。戰後，喚醒了美國不能再忽視日本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發展，以及中國政局的改變，需急起研究，加入龐大的經費。美國東亞圖書館所選的書，主要以人文和社會科學

為主。不少香港二手書店，例如「龍文書店」、「匯文閣」、「神州」書店等等，在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應運而生，以出口為主，在中國網羅舊書，供應北美圖書館。「龍文書店」的東主是1949年後從上海來香港的許晚成。⁸「龍文書店」的往來書信和訂單副本現存於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檔案室內，其中一張訂單列有「受匡出版部」《嬰屍》這本書。當時香港的書商供應給國外圖書館的書都喜歡貼上或印上自己書店的名稱。從「受匡出版部」出版《餘灰集》及《貞彌》兩書的內頁得知是購自「匯文閣」⁹。上述三本書現收藏於耶魯大學圖書館。

翻查圖書館目錄後，查閱盧瑋鑾教授捐贈與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香港文學檔案」，發現以筆名「田芝」¹⁰發表於1982年的《星島日報》副刊「人物篇」中有關於孫受匡和「受匡出版部」的四篇文章：〈香港文學〉¹¹、〈受匡〉¹²、〈早期文藝副刊〉¹³及〈民族與愛國〉¹⁴。「田芝」這樣形容孫受匡：「一位愛好和愛護中國文化的人物」¹⁵，「在香港這個城市，若說到『愛國資本家』，

8 許晚成在上海時，除寫書出版外，亦從事多項調查，例如全國報刊社、文化機構圖書館，上海及全國學校、醫藥業、教育統計資料等等，並將調查資料出版成書。

9 「匯文閣」書店地址，只列香港郵箱3357號，因為「匯文閣」書店的店主黃志清，正職是教師。「匯文閣」改組後，改名為古佚小說會。「匯文閣」的黃志清在世時向筆者嘆道，香港地少，租金昂貴，書信和訂單副本難保留。

10 田芝，本名陳紹統，廣東人，1927年來港。曾任《立報》、《珠江日報》採訪主任。

11 《星島日報》1982年1月4日，頁13。

12 同上，1982年11月11日，頁33。

13 同上，1982年1月5日，頁34。

14 同上，1982年11月13日，頁33。

15 同上，1982年1月5日，頁34。

我相信少不了要將受匡出版社的主人包括在內」。¹⁶

我找孫受匡背景資料也不容易，我發覺資料零碎得很，例如：1937年12月以後，香港報章再沒有提及孫受匡；又，1931年以後，找不到「受匡出版部」的資料。「受匡出版部」的資料最後見於1931年第一次面世的《廣東商業年鑑》。¹⁷

本書上半部的着墨點是孫受匡的生平、著作和「受匡出版部」，下半部簡單介紹「受匡出版部」的作家群。

孫受匡的成長，受「五四運動」影響。1919年6月初「五四運動」爆發後一個月，香港有學生上街支持「五四運動」。受制於當時香港殖民地的管治，孫受匡及其他13間學校學生的響應方式，是積極辦義學，教育貧苦大眾，「策群義學」由此生誕生，由1919年運作至1941年香港淪陷為止。孫受匡認為惟有教育才可以改變國家。

1919至1929年為香港新舊文化交替、新文藝大爆炸的時期，這十年的文化歷史較少人觸及。在這十年裏，作為一個商人，同時又是文化人的孫受匡，默默地奔走於廣州與香港之間，尋找作家，協助他們出版新文化書籍；而他成立的「受匡出版部」，並不以出版社自稱。曾在「受匡出版部」出版書籍的作者，現找到共23位，主要作家有袁振英、歐陽山（羅西）、黃天石（傑克）、謝晨光、龍實秀、倪家祥，其他作者還有汪幹廷、容融、任穎準、昶超、（薛）伯賢、鄭仲謨、馮慕韓、紅薇……等等，其中有些作家嚮往上海新文學的蓬勃，也涉足了當地文壇，

16 同上，1982年11月11日，頁33。

17 《廣東商業年鑑》（廣州：廣州市商會發行，1931），頁180。列在「文房用品書籍」欄內，並簡單以「受匡部」為名，地址是昌興街22號。

例如廣州的歐陽山，後來轉往上海發展；廣州的龍實秀、香港的謝晨光等，也在上海發表文章及出版。相信讀者從這些作家身上，也可以一窺粵、港、滬的文化交流。

2022 年 11 月 4 日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按語：本書引文盡量保留原刊物所用字詞，因此偶有出現原文誤植之用字以及異體字。